

对清代辑佚的两点认识

张 升

辑佚是传统治学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在今天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据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辑佚是起源于宋代，至今约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今天，我们不应仅仅把它当作传统治学的一种方法来继承，更为重要的是，还应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也就是说，不应只停留在“功力”层面上认识辑佚的历史和作用，而应从“学问”高度上来探讨辑佚的起源、兴衰，辑佚的方法、意义，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现象。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人著文对辑佚进行不断的理论探索，并尝试着提出建立“辑佚学”的初步构想。清代的辑佚是辑佚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以前学者研究清代学术注意、用力不够的地方。本文就是希冀在对清代辑佚发展特点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寻找出其带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为辑佚学的创立作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清朝辑佚发展所经历的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康熙中叶姚之骊辑书始到清末光绪年间王仁俊辑书止，大约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下面四个阶段：一、康熙中叶至乾隆四库开馆（1773年）时期。这个时期是辑佚的兴起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一些大学者为了治学的方便、需要而从事辑佚，因此可称为“学者的辑佚”时期。二、四库开馆对《永乐大典》进行辑佚时期（1773—1781年）。这个时期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因此可称为“馆臣的辑佚”时期，或简称馆辑时期。

三、馆辑之后至十八世纪中叶时期。这个时期是辑佚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的辑佚以几位大辑佚家的辑佚之作为代表，因此可称作“辑佚家的辑佚”时期。四、十八世纪中叶至清末时期。这个时期是辑佚的衰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前人的辑佚进行拾遗补漏的补辑、重辑工作，因此可称作“补遗的辑佚”时期。从“学者的辑佚”到“馆臣的辑佚”、“辑佚家的辑佚”、“补遗的辑佚”，我想基本能反映出清代辑佚史的大致线索和各个阶段最显著的特征。

从总的来看，清代的辑佚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无法与校勘、辨伪、训诂之学相比。这主要是因为清人对辑佚认识的局限性。那么，清人是如何看待辑佚的学问性的呢？另外，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学者的治学必然也会留下特殊的历史印痕，那么，言必有据、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考据学风对辑佚活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想就这两方面来谈一下对清代辑佚的总体认识。

（一）清人对辑佚学问性的普遍怀疑倾向

这种怀疑倾向主要表现在下面三方面：一、从事辑佚的大多是一些不太有名、且学术上并不很为世所重的、无甚建树的学者或藏书家。他们由于自身考据能力的有限，虽然于搜辑上苦力有加，但也免不了出现许多纰漏。而一些大学者的零星辑佚，只是更多地作为一种消遣，根本上不能代表清代辑佚的主流。二、清代学者很少对辑佚作系统的总结性分析研究，因而造成辑佚理论上的相对贫乏。尽管许多辑佚家在辑佚上相当努力，且功底很深，辑佚经验相当丰富，方法也很完善，但从他们的辑书序言或文集中却很难发现他们曾经对辑佚经验进行过总结。三、当时的辑佚家并不能以辑佚名家，他们得以求名的只能是考据学上的建树。他们也不能据“辑佚之道”开业授徒（惠栋授弟子以辑书法，只是把辑佚作为考据之入门，恰恰证明辑佚是等而下之的学问）。①

可见，辑佚之道并无师徒授受之门径，唯靠学者之自觉。就整个清代而言，辑佚大家在社会上缺乏门生的力量，他们的用力、成就，虽然当时学者明了于心，但终究不如训诂、校勘诸学声势之盛、气势之壮。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绝大多数学者的学问高下往往取决于他们的考据成绩，因而即使是在辑佚的繁荣时期，许多大辑佚家也十分重视自己的考据学成就，以增加其治学的“学问性”。章宗源的辑书纯粹是为了编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就连马国翰这样的辑佚大家也免不了作《目耕贴》以证其考据之能力。其他的辑佚家也多有考据著作，如王谟撰有《尔雅后释》、《家语广注》、《尚书杂说》、《左传异辞》、《论语管窥》等，张澍撰有《说文引经考证》、《诗小序翼》、《读书抄说》等。可见，辑佚并不是清代辑佚家们治学的最终归宿，起码不是他们理想的归宿。而这归根到底在于清人对辑佚学问性的怀疑倾向，亦即是他们普遍有着把辑佚作为治学的一种基础性手段，不是学问本身的想法。这种思想以章学诚为代表，而章学诚又是清代在辑佚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②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深思。

章学诚的辑佚思想其实是直接渊源于章宗源，^③况且章宗源本身就是一位大辑佚家，因而应该先谈谈章宗源的辑佚思想。孙星衍所撰《章宗源传》中引述章宗源的一些言论基本上能反映出他的辑佚观点：一、辑书虽不由性灵，而学问日以进，久之可以为古文骈体文。二、尝恨曩时辑录已佚之书不录见存之书，订正异同文字，当补成之。三、已辑各书编次成帙，皆为之叙（序），通知作者体例曲折，词旨明畅。四、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书成后此皆糟粕可鬻之。^④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他并不把辑佚当作学问本身；他的辑书目的是为了撰《隋书经籍志考证》。关于这一点，姚振宗说得更清楚：“（章书）甚仿王伯厚（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其于著录之书不求甚备，而篇叙

之文反有所考。于撰文始末不必甚悉，而传论类书所引诸佚文则独致其详，……本意因辑书而为是，志皆从辑本中约略录出。……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学。”^⑥可见，辑书只是他撰修《隋书经籍志考证》的准备工作，等他修完《考证》之后，那些辑得的佚书就自然散失了。^⑥

章学诚能够对辑佚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基于他对世风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的许多明见卓识是源自于他是一位个性鲜明、不苟俗见的理想型学者（诚然，也有许多想当然的理论）。他对辑佚的批评也是其对世风的针砭连带而起的一种学术观点。他说：“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⑦“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⑧这种对世风的批判已经导源了他有关辑佚的“功力与学问”之辨的思想。他进一步指出：学问是学者之归宿。他对学问的理解跟章宗源是一致的，即认为是学者之所发明，为性情之自得。“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⑨他指出王伯厚（应麟）之所杂纂，只是功力，不是学问。功力与学问之间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习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学问中之功力，万变不同，尔雅注虫鱼，因可求学问，读书观大意，亦未始不可求学问，但要中有自得之实耳，中有自得之实，则从入之途，或疏或密，皆可入门。”^⑩但是，在章学诚的思想里，“纂辑”与“著述”、“功力与学术”、“秣黍与酒”显而易见是既对立而又统一的。“著作本乎学问”，而“札录之功，……不可

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

“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①一切的学术都体现为“纂辑”与“著作”，广义上的纂辑包括考据名物、训诂、拾遗搜隐（辑佚）等，仅存为一种功力；“著作”则如章学诚所指出的：“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于性情有所自得。”^②前一种主要体现为考据笔记，后一种体现为历史著作。因而章学诚本于学问与功力之认识而提出用“史”代替“经”的思想：经之流变必入于史。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于纂类记注。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章学诚所谓“史识”）。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于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③章学诚的这种思想，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王伯厚“纂辑”的学问性和“通经致道”的可能性，而且是对被誉为清代学风开创者的顾炎武所提倡的“著书不如抄书”的反动。

章学诚的“功力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人对辑佚的根本认识。由于这种认识的影响，使得清人在对辑佚的思考上，只停留于“功力”层面，而不能上升到“学问”高度。虽然实践中很多辑佚大家把辑佚当作学问本身看待，把辑佚当作为学者自觉的治学责任和治学方法，为辑佚而辑佚，但他们没有能加以理论总结，见诸文字，因而正如章学诚所说的：“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

章学诚的思想也直接影响到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中对辑佚加以了辩证的总结。他说：“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此专家研究资料者亦不少。然毕竟一钞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成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的《后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佚文和什么伪妄的《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大惑不解。”^⑭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赞赏是出自于对清人辑佚功力的佩服，而于学问上则有轻视的倾向。

这种辑佚的“功力说”在现代学者中也有继承。如钱穆：“校讎摭拾，则只是学者预备功夫，非可语于成学。”^⑮又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指出：“惠书（指惠栋《易汉学》）之贡献，不过搜讨之勤，能使久坠之汉儒学说，复活于人面前耳，谓其有功于《易》道，则未必也。”^⑯“清代学者颇精于古书之整理，使后人读书省无限之精神，而其于诸子学之复兴，影响于近时之新思想尤钜。吾辈受其遗赐，承其‘功力’之贡献，而益求创造焉，则将来中国学术界必有光明灿烂之一日，清儒之功，亦不可泯也。”^⑰

（二）清人辑佚的普遍原则（指导思想）

清代的辑佚经历了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学者对辑佚之认识各有不同，他们的辑佚方法、所辑对象、范围等亦都不尽相同。但是，通过分析研究不难发现，清人的辑佚实践表明了他们的辑佚始终贯彻着某种指导思想，遵循着某种普遍原则。这种指导思想是对清人辑佚经验的总体认识，也是衡量清代辑书质量优劣的标准。这种思想在他们的辑佚实践中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是各人贯彻的程度不同而已。它包括四个方面：求用、求古、求全和求善。这种思想，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为一种总的原则、规律的话，那么它的出现也兆示着清代的辑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考据

学的附庸而显示出它独立性的一面，亦即是辑佚作为独立学科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它在清人的治学中不仅仅“存乎功力”，而是“成学”了。

1. 求用。“求用”的内涵，一开始是狭窄的，专指做学问而言，“求用”等同于“为学”。如惠栋辑《九经古义》对于治汉学，姚之骅辑诸家后汉书对于治史学等。由全祖望、李绂导源，馆辑把这种“个人之用”扩展为“社会之用”，即包括“有关宏旨大义”、治世教化等的“经世致用”。^⑧后来的辑佚家更把这种“社会之用”与“个人之用”贯穿起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寻求辑书的价值取向和作用。如“辑佚家的辑佚”时期，辑书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宽。但是，即便是为辑佚而辑佚的辑佚兴盛时期，辑佚也不是无原则的，也是在“求用”思想指导下进行辑佚。诸如“存此残佚，少而弥珍已”、“吉光片羽，益以罕而珍已”、“古学已绝，聊存一线”、“断简残壁，沾溉无穷”等等对于辑书价值的强调，正好说明了这些辑佚家“求用”心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谟，他不拘泥于“个人之用”与“社会之用”，而从文化的角度上认识文献的价值，把“经世致用”的“求用”思想更向前推进一步。他指出：“惟是天下事物消长莫不有数，显晦莫不有时，识大识小则存乎人。谟既幸际圣世文教昌明，经籍道广，如类书丛书，皆得任草野儒生汇辑编次，窃不自量，亦思有所钞辑”^⑨、“窃谓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原非一家之言所能究竟，况自秦火而后去全经已远，微言大义，究未知孰得其真，则于凡经说之纯且精者，固当遵而奉之，以置于圣经贤传之末，即其说之不必纯且精者，亦何妨并载于册……”^⑩王谟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辑佚的意义和价值，认为文献的消长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文献的价值也会有变化，并且对这种价值的认识还依据各人学识的差别而有异。从这种价值观出发，王谟认为古书都是有价值的，都应得到同样的辑佚。总之，清人在辑佚中

有着普遍的“求用”倾向，这种倾向由个人而社会而文化逐步得到深化和提高。

2. 求古。清人在考据上普遍的复古心理，在辑佚上也表现为嗜古的倾向。如果说惠栋所谓“凡汉必真”、“凡汉必好”更多是出于一种学术观点（即对经义的理解），那么后来的辑佚家每辑必言其古，越古越好，就分明是一种嗜古、泥古的倾向。从清人的辑书范围可看出，他们所辑绝大多数是唐以前的佚书，尤以汉代为最多。造成这种辑佚上“求古”思想的原因是：越古的书，散亡越严重，因此辑佚自然以古为主；同时，学术界普遍认为越古的文献价值越大，也就越珍贵，因而更应辑佚；还有，越古的佚书一般来说越难搜辑，有着争强好胜、搜隐奇癖的辑佚家更倾心于此，以此出人头地、见其学识之深，正所谓“唐以前书，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泻水，曰我所学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动人。”^②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使得唐以前许多佚书赖清人的辑佚得以重显于世。但是，一味的崇古也造成了许多误辑（疏校勘、考证）、伪辑（即辑录了根本不存在的书，如许慎《汉书注》和先秦一些子书）。总之，“求古”既体现了清朝辑佚家对辑佚的科学认识，也显示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学者治学上的局限性。

3. 求全。求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于每部辑佚书而言，这也有两重意思：其一是自己所辑的书千方百计求全，亦即是尽可能地提高对原书全貌的恢复程度。一部辑书的优劣往往取决于收辑佚文数量的多少，因而辑佚者都尽力地多加搜辑。其二是对前人所辑书进行补漏，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补全”。这方面的工作清人进行得很深入，他们对清朝以前的辑书基本上都重辑过，并且有的还不止一两次重辑。还有，清人对当代的一些辑书也进行不断重辑。如馆辑之后一些学者对“大典本”的重辑，嘉道之后一些学者进行的补辑工作等。二是辑佚者尽可能地多辑

书。馆辑以后出现了许多大辑佚家，他们所辑之书多则数百种，如马国翰、王仁俊等，少则也有数十种。辑书范围由原来只重经史扩展到四部。这种在辑书数量、范围方面“求全”的思想，体现了清代学者最大限度地恢复古文献原貌的决心和努力。

四、求善。求善也有两方面的含义：就原佚书而言，在体例上尽量依原书来编排，每条佚文都要考证清楚，以确定其为真内容，避免误辑。求善所强调的是对原书恢复的准确度。就辑书本身而言，好的辑书不仅是对原书的恢复，还应体现出各自的辑佚特点。如各书前应有“序录”，道明书籍源流、辑佚的资料来源等；同时，各条佚文都应附有出处，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以注释、考订。清代的一些辑佚大家，他们的辑书基本上能符合上述“求善”的两方面内容。清代学者在“求善”原则指导下，不仅改进和完善了前人的辑佚方法，而且使清代的辑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以上四条原则是清人辑佚实践的指导思想，对辑书的意义、辑佚的范围与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反映了清人对辑佚的科学的、客观的认识，也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学者治学的某些思想倾向性。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的辑佚工作同样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清人对辑佚虽然有着普遍的怀疑其学问性的倾向，但清人在辑佚实践中所企求并刻意贯彻的“求用、求古、求全、求善”的指导原则，正是辑佚的学问性之所在。这些原则贯彻得越彻底，辑佚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学问性就越强，辑书的质量就越高。也只有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辑佚才能真正超越“功力”的层面而走上“成学之道”。

注:

①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330页。

②参见章学诚《校讎通义补郑第六》。

③参见拙作《〈史籍考〉撰修考》，《史学论衡》第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孙星衍《五松园文集·章宗源传》。

⑤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叙录》。

⑥章宗源所辑之书的下落，至今不明。

⑦《章氏遗书》卷29“上钱辛眉宫詹事”。

⑧《章氏遗书》卷9“与汪龙广书”。

⑨《章氏遗书》卷9“与邵二云书”。

⑩《章氏遗书》卷29“又与上甫论文”。

⑪《章氏遗书》卷9“与林秀才”。

⑫《章氏遗书》卷27“淮南子洪保辨”。

⑬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97页。

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5页。

⑮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474页。

⑯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612页。

⑰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册588页。

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圣谕》。

⑲王谟《汉魏遗书钞·自序》。

⑳王谟《汉魏遗书钞·经翼钞序》。

㉑《中国古代教育论著选》上册47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